

Asia's New Order

亚洲 新秩序

郑永年 著



Asia's New Order

亚洲新秩序

郑永年 著

SPM
广州·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洲新秩序 / (新加坡) 郑永年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218-13181-8

I. ①亚… II. ①郑… III. ①亚洲—研究 IV. ①D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1889 号

YAZHOU XINZHIXU

亚洲新秩序

郑永年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主 编：李怀宇

责任编辑：李展鹏 张 静

装帧设计：张绮华

责任技编：周 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6 字 数：140 千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3157 83795240 邮购：(020) 83795240

自序

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李怀宇先生这些年来一直关注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他频繁走访他们，在把海外中国研究介绍给中国读者方面花费了不少心血，已经出版了介绍海外学者及他们的研究的数本著作，令人印象深刻。他数次来新加坡和我交流，经常谈及这些年来我所进行的研究。他对我有关亚洲新秩序的一些看法非常感兴趣，认为可以围绕这个主题出版一本集子。不过，我主要的关切点还是中国以及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在我把计划中的中国研究项目做完之前，或者说在把中国研究得比较透彻之前，我并没有计划出版一本专门有关亚洲秩序的书。但我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是因为：首先，中国研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永无止境。这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就出现越来越多的研究课题，都很重要，自己也都很有兴趣。其次，没有一个人可以声称自己可以把中国研究透了。实际上，研究越深入，越发现自己做的事情实在很少、很小。要把中国研究透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再者，回顾一下自己这些年走过的研究道路，发现的确已经写了不少有关亚洲秩序的文章。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我一直关切中国内部的改革发展及其外部影响。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实际上和亚洲秩序的变迁密切相关。不讨论亚洲这数十年来的变化就很难理解中国本身的变化；同样，不理解中国这些年的变迁也很难理解亚洲秩序的变化。现在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亚洲秩序的变化更离不开中国因素。尽管中国本身并没有称霸亚洲的想法，但中国崛起本身

已经把中国推到了亚洲秩序的中心位置。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我们探讨中国崛起之后的亚洲秩序，无论从学术上还是政策上都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不过，答应了怀宇先生又觉得后悔，因为要从过去的研究文章中挑选一些并整合成一本比较系统的著作实在不易。但既然已经答应，也只好继续做下去。利用春节期间的几天假期，我把原来的研究文章找出来好好看了一遍，对自己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很快就找出一条组织文章的有效思路来。更为重要的是，我并不觉得这些文章需要做很多修改。多年来，我也讨论一些亚洲时事变化，但这样做的时候，总是把时事变化置于宏观历史中来讨论，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亚洲历史。这种讨论方法使得文章具有了一种“长效”价值。重读旧文，尽管时事不一样了，但背后的逻辑仍然如此。实际上，经常回顾一下自己以前的研究，更能知晓自己是否有能力提供有效的知识。知识如果经不起时间的检验，那么研究者就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了。

因此，这里也没有必要概括这本书的主体思想了，让读者自己去发现、去解读是一种更好的办法。但利用这个时间，我想简单讲一下这本书的“组织”思路，作为“导读”。这本书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西方秩序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和危机。为什么一本讨论亚洲秩序的书要从讨论西方秩序开始？道理很简单。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亚洲秩序是西方秩序在亚洲的延伸。直到今天，亚洲很多国家的内部秩序高度依赖西方秩序。西方内部秩序的变化必然对亚洲各国和各地区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西方秩序变化看亚洲能给人一个新的视角。

第二部分讨论全球化状态下的亚洲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变化及其面临的挑战。

第三部分围绕中国崛起来讨论亚洲地缘政治秩序。文章原来的目的也是讨论中国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困难的。不过，现在把文章置于中国崛起对亚洲地缘政治秩序重塑的构架中，则别有一番新的意涵和理解。如果说，中国的崛起既不可避免，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现实，那么中国如何塑造亚洲秩序便成为人们关切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那么多年来亚洲社会和国际社会所关切的问题。不过，正如讨论亚洲社会内部政治经济秩序时离不开讨论西方，讨论亚洲地缘政治秩序也离不开讨论外部力量，尤其是美国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直到最近，亚洲地缘政治秩序仍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秩序在亚洲的延伸。只不过中国的崛起又必然导致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产生和发展。今天的亚洲地缘政治秩序实际上是以西方（美国）为中心的旧秩序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秩序互动的产物。中国如何处理与旧秩序的关系决定了这个新秩序是怎样的。这部分界定了十三个大方面来讨论中国的崛起和亚洲秩序。

本书所收录内容已经在不同地方发表过，其中几篇和杨丽君教授合著，这些在每一部分最后都有说明。这次出版，对内容进行了一些修订。在不同时段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作者受惠于与很多学者的讨论和交流，再次感谢他们，但不一一列举名字了。也非常感谢李怀宇先生，没有他的倡议和“施加”的压力，作者也不会有出版这本小书的想法。最后，文责自负，文中所出现的错误都是作者自己的。

郑永年

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
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目 录

自序	1
21世纪的民主危机	1
一、西方所认知的当代民主危机	3
二、政治治理与当代民主问题	7
三、地缘政治和民主秩序危机	13
四、民主的危机及其未来	22
全球化与变迁中的亚洲秩序	29
一、全球化与亚洲	29
二、资本、国家与全球化：简单的历史	32
三、全球化与经济活动的“去主权化”	34
四、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	41
五、全球化与弱政府	43
六、全球化中的东亚秩序模式	49
七、全球化与中国秩序模式	54
八、中国秩序模式的未来	60
九、经济结构内部的平衡	62
十、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平衡	66
十一、国家和社会的平衡	72
中国崛起与亚洲秩序	79
引言	79
一、大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理解?	86
二、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	92

三、中美如何共建世界秩序？	98
四、中国需要追求联盟政策吗？	104
五、如何处理海洋地缘政治，崛起成为海洋国家？	111
六、如何处理海洋地缘政治与陆地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	119
七、应当追求东北亚共同体吗？	126
八、如何处理和东盟的关系，避免东盟的分裂？	132
九、如何守住南海“生命线”？	142
十、和印度要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54
十一、如何实现军事崛起？	158
十二、崛起过程中，如何建设软力量？	166
十三、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大国外交？	171

21 世纪的民主危机

苏格兰试图通过公投的方式寻求和平独立。尽管多数人民选择留在英国，但高度分权和自治则是英国必须履行的承诺。也就是说，苏格兰人用民主的方式“解构”着原来统一的中央集权式民族国家，一旦高度分权自治，原来的英国将不复存在。这并不仅仅是英国的问题，欧洲很多国家正在面临类似的问题和挑战。欧洲是近代主权国家的诞生地，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和组织形式从欧洲扩散到世界各地，到当代，没有一个国家不自称为民族国家，即便实质上并不完全是。不过，今天，过去促成近代民族国家诞生的一些原则也在促成其转型甚至解体。

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更令人担忧。近代以来，中东的政治秩序的演变本来就和西方密切相关，中东先是欧洲殖民地，后是美国的。正是欧洲和美国的介入，或者确切地说，西方强权对中东国家的征服，才使得中东国家政权形式具有了现代性。但是，在欧洲和美国的支持下，现存中东秩序有的已经彻底解体，有的正在解体。在原来的政权解体之后，也并没有出现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体，更多出现的是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更为严重的是，在原来的国家“失败”之后，类似“伊斯兰国”的“不一般”的权力组织崛起，不仅对区域构成了威胁，而且随时可以威胁到整个世界。

从总体来看，欧洲传统民主政治的变迁表现为和平，中东政治变迁则表现为暴力和无政府，而世界上其他很多地区则处于欧洲和中东之间，有暴力的，也有相对和平的。

实际上，近年来，民主已经再一次成为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当然，这次的热点不再是 20 世纪 90 年代

初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说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而是相反，这次人们热烈讨论的是民主所面临的危机。西方的一些政策和新闻杂志如《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和《经济学人》（*Economist*）等连续发表文章和评论，讨论这个问题。人们只要看看作者们所使用的那些概念和标题就会大体上知道他们所要探讨的问题，例如“民主的衰落”（decline of democracy）、“民主萧条”（democratic recession）、“民主的回撤”（democracy in retreat）、“民主的倒退”（democratic reversal），等等。

的确，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今天的民主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深刻的危机。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主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表现为不同形式。总体来说，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产生于西方，自西方向非西方传播和扩张，而这个传播和扩张过程的背景，就是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的扩张过程。这个过程并非简单。且不说在西方内部，民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所带来的巨大的政治变革，民主从西方到非西方的扩张的过程更是充满戏剧性，不乏期待和欢乐，也不乏暴力和血腥。无论已经民主化的国家，正在民主化的国家，还是那些还没有民主但在追求民主的国家，都必须思考今天民主所面临的问题。

本文分成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我们讨论西方主流社会是如何认识这场世界性民主秩序危机的。第二部分从民主国家和地区的内部治理的角度来讨论民主秩序危机。第三部分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外部地缘政治的变迁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秩序的。第四部分，我们针对这场危机的未来做些分析，也尽量揭示其与中国的相关性。

一、西方所认知的当代民主危机

民主到底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和危机呢？我们先来看看西方学者的论述，他们是如何看待和诊断今天西方和非西方民主所面临的问题的呢？

简单地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普遍呈现出一种现象，那就是两个极端现象的共存：一方面是公众对民主制度的普遍冷漠，另一方面是西方社会的激进化。公众对民主的冷漠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例如，发达国家的选举投票率一直不高，民众并不认为民主与自身利益有很高的相关性。但社会的激进化则是最近的发展。西方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曾经出现激进化，但此后社会就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在很长时间里，激进化一直被视为非西方世界发展中的社会现象。最近西方社会激进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欧洲的希腊和西班牙的社会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激进化的体现。

民主衰落的最直接原因在于中产阶级的衰落。中产阶级可以说是当代大众民主的主要力量。美国历史学家有句名言：“没有资产阶级便没有民主。”那是指早期精英民主时代。在当代的大众民主中，人们可以说：“没有中产阶级便没有民主。”很多学者，包括亨廷顿和利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都把民主和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最渴望和追求自由并且也有能力去追求自由的阶层。但现在的情况与这些学者的期望刚好相反，中产阶级似乎不再渴望和追求自由了。当然，在这个背后，人们更需要提出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西方的中产阶级到哪里去了？

不过，民主与政治参与之间始终是有矛盾的。民主需要政治参与，也就是说民主需要民众一定程度的政治热情；没有这种热情，表明他们没有政治参与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政

治冷漠是民主的敌人。不过，如果政治参与过度，那么民主又会发生危机。西方社会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所经历的民主危机就被西方学者称之为过度参与危机。如果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政治，那么就会使得民主制度负担过重。

但是，只强调西方民众的政治冷漠远远不够。政治冷漠是有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的，只看到民众的政治冷漠就很难找到西方民主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实际上，在政治冷漠的同时，西方民主也出现了上面所说的激进化，那就是“街头斗争”。民众选择街头斗争这种形式，而非正常的、制度化的途径（例如参加选举），有很多原因，其中主要的因素是民众不再相信这些既定的制度化参与途径仍然具有能力解决民主所面临的问题，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他们要另辟蹊径。历史地看，街头斗争是一种很古老的参与形式。

在非西方社会，民主的情况更为糟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已经失去了其进步的动力，要不已经沦落为政客们操纵的民粹主义。在埃及，伊斯兰主义运动在推翻了旧政权之后，便挟持了民主，试图重新把国家转型为宗教政治。在泰国，民主不仅没有使得国家的各个社会阶层更加整合，相反，民主在有效地分化着社会，使得国家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在俄罗斯，尽管苏联解体之后，出现了多党制、选举等西方界定为民主的东西，但实际的人权在恶化。在乌克兰，民主只是腐败寡头政治的轮流执政，与民众没有多少关系；分裂的政治力量更使得国家面临外力的干预，导致国家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说，在非西方，很难找到几个运作良好的民主政治。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民主还继续在非西方扩张，或者说民主仍然是非西方国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或者价值，从而出现了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泛民主主义。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在进行政治建设或者改革时会缺失“民主”这个概念，大家都认为需要民主，也相信自己在追求民主。但另一方面，伴随着民主快速

扩散，出现民主的“劣质化”。所有这些社会只有西方式民主的表象，而没有西方式民主的实质。

不管怎样，今天的民主政治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这些威胁也导致了“民主的倒退”。西方的一些主流学者指向了如下几个主要威胁：

第一个威胁来自非西方世界的“竞争性权威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和“模拟民主”（imitation democracy），也就是说，非西方社会的新兴民主中，“非自由主义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越来越多。非西方社会的这些“非自由主义民主”威胁着西方真正的民主。在这些“非自由主义民主”中，很多国家使用民主的制度和话语来维持实际上的统治者的个人权力或者统治集团的权力。

第二个是西方民主更面临着来自权威主义的政治威胁。从历史上看，民主社会一般也是富裕社会，民主是和富裕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逻辑就是，“要富裕，找民主”。但某些实行权威主义政治的国家即使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同样可以致富，并且以更快的速度致富。这种模式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仍然处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个威胁来自西方国家本身，也就是原来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衰落。主要在于，支撑西方传统民主的基础在当代社会已经不再存在。上面所讨论的中产阶级的衰落就是一个主要因素。（当然，中产阶级问题只是表象，西方民主衰落具有更深刻的根源。）

第四个威胁来自西方国家没有能力将其价值观和其外交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里指的是民主扩散过程的政治动力危机。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扩散的过程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人为推动的过程，其中西方政府的推动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很长历史时间里，西方各国总是能够把其民主价值和其外交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冷战期间和之后，或者说苏东剧变之后，

西方国家能够把外交政策和其价值观结合起来，尽管这种结合并不总是成功的。

实际上，西方民主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苏联存在的时代，西方视共产主义为大敌，西方文明之下的国家能够团结起来，聚焦于其民主价值，使用各种方式来扩散其民主的力量。二战之后，西方民主之所以能够迅速在非西方世界扩散，和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所拥有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优势是分不开的。但今天的西方已经对价值外交力不从心了。例如，一直致力于推动西方民主全球化的美国，现在已经变得更加“内向型”了。美国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不仅是为了反恐，而且也是为了推行民主，但现在尽管那里的民主没有一线巩固的希望，美国却由于国力的衰退，努力想从这两个国家撤出。同样的原因，美国不愿意有力干预叙利亚，对乌克兰局势也一筹莫展。一旦当西方民主的“输出国”缺少输出能力的时候，不仅西方的输出过程没有了动力，而且现存的非西方民主也会出现问题。

第五个威胁来自对民主的简化。无论是西方内部还是非西方国家，民主越来越简化成为选举。选举本来就只是民主的一个部分，民主还有比选举更重要的要素，例如道德价值、文化传统、精英共识等等。但现在的民主过分强调选举，忽视了民主的其他价值观和法治。“没有选举，便没有民主”，这是西方的信念，因此西方不仅仅自己注重选举，而且还大力在非西方国家推行选举，似乎一旦有了选举，这个国家就可被视为是民主的。同样，这也是非西方的信念，在非西方世界的争取民主者，无一不是把选举作为目标的。但正是这种简化，使得民主失去了其传统的核心价值，成为政治人物获取权力的一种工具。

当然，对民主构成的威胁远远不止这些因素，但这些因素是大多数西方学者所认可的。不难发现，不管什么样的因素，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即西方民主内部的问题、非西方民主所

面临的问题和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传播和扩散过程的问题。对西方学者对民主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的民主所做的分析，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评估，但如果人们从这三个层面来讨论民主问题，的确可以促成和深化人们对 21 世纪民主所面临的挑战的认识。

二、政治治理与当代民主问题

在讨论当代民主危机的时候，一些西方学者从一个民主国家内部政治治理的角度提出了两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第一个是针对西方民主的，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民主危机到底是因为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所致，还是由目前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缺陷所致？第二个问题是针对非西方国家的民主的，即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倒退并且转向权威主义到底是因为这些社会希望权威主义的统治还是这些社会的民众对现存“半民主”状况的不满？

这两个问题对人们分析当代民主问题具有指引作用，即引导人们提出更为深刻的问题。人们不难从这两个问题出发，再深入来讨论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民主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这并不是说西方和非西方民主所指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民主在西方和非西方的表现形式是否不同？民主是从西方扩散到非西方的，那么至少可以说西方和非西方民主处于不同的阶段。

第二，西方把自己的民主视为自由民主，但这种民主不是从来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即使在西方，民主也具有历史性，传统的民主制度和现行自由民主制度模式是很不相同的。所以，如果民主具有阶段性特征，那么民主也必须是变化的。

第三，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经常出现“倒退”，即退回到原先的权威主义体系。也就是说，非西方的民主往往呈现出不稳

定性。那么这种不稳定性的根源是什么？是民主形式出现了问题，还是那里的社会出现了问题？

第四，发展中国家民主的倒退或许是因为人民对民主的不作为感到不满意，或者是对现存的“半民主”状态不满意。这种现象在发展中社会非常普遍。很多人对民主现状不满意，希望现在的“半民主”状态演变成为西方式的“全民主”状态。很少有人会说民主形式有问题，而往往认为是民主不足。不过，这里又可以提出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往往是“半民主”而非“全民主”？为什么“半民主”状态很难转型到“全民主”状态？这种转型的困难到底是因为制度设计、政治精英等人为的因素还是有其他的客观因素？

民主是具有历史性的。人们把西方民主称为自由民主模式，但这一民主模式产生的时间并不很长。现在，很多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把非西方民主统称为“非自由民主”、“竞争性权威主义”和“模仿民主”等等。但历史地看，西方民主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也都是“非自由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普选权也只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得以真正实现。之前，对选举权有诸多的限制，例如财产、性别、种族等等。美国被视为是民主的典范，但美国民主在很长时间里保留着奴隶制度，直到林肯总统的时候才废除。如果说当时的西方民主是自由的，那也只存在于精英之间，也就是精英民主。因此哈佛经济史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给民主的经典定义就是精英们对大众选票的竞争。

今天人们在西方所看到的大众民主，也就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全面实现。不难看到，大众民主的实现是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前提条件的。首先是经济的。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国家的经济活动，而且也使得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身份转换（例如从农民到工人、从工人到中产阶级等）。其

次，从政治层面来说，在欧洲，早期平民进入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政府动员平民为国家而战，相应地也要赋予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平民的政治参与到了二战之后迅速扩展开来，政治参与越来越成为民众权利的一部分。最后，从社会层面来说，大众民主离不开大众教育。政治参与并非简单的投票行为，在投票的背后更是对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理性选择。要做理性选择，对信息的掌握和分析至关重要。教育的重要性也体现在这里。简单地说，从社会结构来说，中产阶级是大众民主的主柱。实际上，这一切前提都反映在中产阶级身上，例如有产、对社会的贡献、教育、理性、独立、宽容等等。

所以，说穿了，民主就是精英与平民之间的一种互动形式。精英和平民的质量都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这两者之间互动的平台，即法治之上的政治架构。

说西方当代民主出现了问题，那么就要从精英和平民的互动及他们互动的平台去找。在精英层面，大众民主所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政治的去道德化和价值化。传统民主可以理解为精英之间的互动。精英之间的共识至为重要，他们对民主具有共同的认同，具有相当一致的道德价值，遵守共同的规则。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传统民主中能够参与政治的是少数，选票的作用并不是很大。诚如马克思所说，民主是不同政党的轮流执政，但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可解读为当时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精英民主就是精英之间的互相“选拔”，民主只是对所“选拔”出来的候选人的一个正式认可。

但在大众民主时代，精英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众多变化中，去道德化和价值化对民主质量的影响最大，也最为负面。为什么？很简单，大众民主下，选票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谁是精英取决于谁得到的选票最多。选票就是权力。在一切为了选票的情况下，民粹主义变得不可避免。今天，民粹主义不